

我国失业率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钱小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综合部 100017)

一、背景与目的

按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较成熟的失业理论,失业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经济循环所影响的需求不足性失业;另一种是劳动市场供求结合机制不完善所产生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解决前者的需求不足性失业,需要动用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短期性效果;解决后者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则属于劳动就业政策的范畴,既有短期的对策,更注重长期结构性的改善。因此,首先必须明确失业的类型,才能采取相应的政策加以解决。

上述失业类型的划分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我国。面对我国日趋严重的失业和下岗问题,大部分人认为:(1)我国的经济增长还在高位区,不可能出现需求不足性失业;(2)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失业主要由供给过剩造成,而与经济波动无关;(3)过去几十年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过度就业”正在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而显性化,由此引发失业和下岗人员增多;(4)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阻塞了劳动力的转移。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而经济波动对失业的影响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便现已开始的新一轮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中已经把就业当作了头等解决的目标,或一些人士主张应把就业作为长期的宏观政策调控目标,但两者在理论上都没有作充分的论证。

政策选择的基本依据是怎样看待我国的失业率。虽然我们在很多场合约定俗成地使用失业率这一指标,但由于对失业率的类型和性质至今缺乏基础性的和深入的分析,使我们对失业率的性质定位很不明确。一方面,不仅认为在种种限制下它不能反映我国失业的实际情况,还普遍认为失业率取决于上述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因素以及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搅乱因素,而受经济循环因素的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在实施政策时却又较随意地将失业率作为反映经济波动的指标来处理,对失业率的认识和实践上有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一面。

本文试从政策选择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我国失业率的实证分析,致力解决以下问题:(1)最近失业恶化是否有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因素的影响?(2)明确失业率的性质,即我国失业率究竟能够说明和反映什么?能否把它看作我国劳动市场供求状况的指标?(3)明确今后将失业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目标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以确立就业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长期地位。

二、从流量分析看我国失业的形成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失业率经过80年代初和80年代末的两次高峰,正在迎接第三次高

这种失业类型的划分方法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并成为教科书的内容,在政策实践中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普遍使用这种划分概念,具有代表性的OECD(1994)的政策报告中便使用这种概念。

峰,1997年底达到3.2%。高涨的失业率是存量的变化,流量的变化才是引发失业率高涨的直接原因。通过对失业的流入流出分析,可以总结出我国的失业具有以下形成机制和特征。

(1) 失业的形成机制——失业的发生以青年为主。

劳动力的状态一般可分为三种:一是就业的状态;二是失业的状态,即劳动力没有工作,但是具有劳动愿望,正在劳动市场寻找就业机会;三是非就业者状态,即劳动力没有工作,也没有进行失业登记,不属于失业者,但是如有机会便会进入劳动市场,成为就业者或失业者。一般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非就业者主要是家庭妇女,而我国的非就业者则主要是新生劳动力、转业复员军人和农转非人口中的劳动力等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

因此,失业的发生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非就业者进入劳动市场时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而成为失业者,二是就业者转为失业。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年新登记的失业者中,由非就业者流入失业的为349万人,占3/4,就业转失业的为131万人,只占1/4。再从当年准备进入劳动市场的非就业者来看,初高中以上毕业生的新生劳动力约523万人,占主要部分,复员转业军人38万人,农转非人口中的劳动力120万人,直接从农村招收148万人。再考虑到存量的年末失业者中青年所占的比例很高,1992年为止一直高达80%以上,1995年底也保持在60%,可以判断,我国的失业发生主要是新生劳动力在进入劳动市场时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所引起的。因此,我国的城镇失业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青年的失业问题,这与我国1994年以前一直使用“待业率”的概念是极为相符的。

另一方面,我国的现行就业制度下企业被迫地或自觉地不削减职工,即使采取下岗制度也要维持劳动关系,同时失业登记也有严格的限制,使就业转失业不容易发生,抑制了这部分人向失业的流入。劳动需求的变化很少通过裁减直接反映到失业的流入上,这是我国失业的另一大特点。预计2~3年后没能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将可能使就业转失业大幅增加,但是起码到现在为止,企业对于职工的就业保障责任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失业登记方法也没有大的改变,可以认为失业率在性质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仍具有连续性。

失业流出方面,我国失业者的出路主要是重新就业,1996年失业者中再就业人数为413万人,转为非就业者退出劳动市场的仅34万人。失业者重新就业,在劳动市场中面临与新生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竞争。而且失业者中大部分是青年,他们与新生劳动力属于同一性质的劳动力,规模也旗鼓相当。因此能否解决失业者的再就业,一方面取决于就业机会的扩大,另一方面取决于新生劳动力的供给和农村劳动力的使用。

失业的流入和流出同时也受到农村劳动力的影响。农村劳动力以合法或非合法的身份进入城镇劳动市场,构成与城镇非就业者和失业者的竞争,促使失业率升高。但其流入规模并不象新生劳动力那样稳定,既受经济景气等劳动需求变化的影响,又受制度上时松时紧的种种限制,弹性很大。如农村劳动力被城镇单位直接招收的人数1990年曾下滑到74万人,1995年上升到162万人后,1996年又下降到148万人。当然这些数据并不一定囊括进入城镇劳动

这里使用了《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当年城镇劳动力供给总数”的统计数字。

我国很多大城市制定了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条例。比如北京市在1997年开始实施的条例中规定,招用科技、文教、经贸以外的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必须在劳动行政机关批准的工种范围内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办理手续,禁止私自招用。

市场的全部农村劳动力,但是它能显示出城镇使用农村劳动力规模的变化方向。

(2) 失业趋于长期化——突出矛盾由劳动供给过剩转向劳动需求不足

上面分解的各个流量决定失业者存量的水平。这里我们将每年年末的失业者增加数 U 分解为非就业者流向失业的流量变化 NU 、就业转失业的流量变化 EU ,以及继续失业者的变化 UU ,前两者的流量是失业的发生即流入,后者的流量表示失业流出的程度。表 1 显示了这些流量对于年末失业者增加的影响程度或贡献度。

从表 1 可以观察到,非就业者向失业的流入 NU 对失业增加 U 的影响时大时小,1995 年以后它已不是失业增加的原因,不象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劳动力供给过剩会固定性地造成失业率上升。这里一方面有非就业者增加不多的原因,特别是其中农转非劳动力还在减少,一方面也有城镇单位控制招收农村劳动力的影响。

1995 年后失业率增加的原因则主要是因为就业转失业 EU 和继续失业 UU 的增加。就业转失业的人数 1995 年到 1996 年从 99 万人增加到 131 万人,说明一部分现有就业机会消失显著,它既有经济收缩带来的劳动需求全面减少的原因,也有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等局部性的结构性原因。继续失业方面,1993 年以后 UU 一直增大,即失业的流出开始减少,失业趋于长期化。特别是 1995 年以后失业流入增加($NU + EU$)已经为负值,流出 UU 减缓便成为失业增加的主要原因。前面我们曾分析到,失业者与新生劳动力基本属于同一性质的劳动力,那么在新生劳动力向失业流入减少的同时失业者却再就业困难,就说明新的就业机会供给不足是主要问题。失业已由劳动供给过剩突出转变为劳动需求不足突出,需求不足性失业的因素在增加,与这两年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有一定关系。

表 1 失业流量对于失业存量增加的影响度

年	年末失业者的增加 U	非就业者向失业流入的增加 NU	就业转失业者的增加 EU	继续失业者的增加 UU
1990	5.3	- 15.0	- 0.3	20.6
1991	- 31.0	- 26.8	0.5	- 4.7
1992	8.1	37.1	11.9	- 41.0
1993	59.8 (100.0)	16.4 (27.4)	1.9 (3.1)	41.6 (69.5)
1994	56.3 (100.0)	25.3 (45.0)	9.9 (17.6)	21.1 (37.5)
1995	43.2 (100.0)	- 51.8 (- 120.0)	0.8 (1.7)	94.3 (218.3)
1996	33.4 (100.0)	- 48.5 (- 146.1)	32.2 (97.0)	49.5 (149.2)

注: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计算,实数单位为万人,括号内表示各流量的贡献度。

$$U = NU + EU + UU.$$

三、从存量变动看我国失业率的性质

在上述流量的形成机制下,作为存量的我国失业率如何表现需求不足性失业和结构性摩擦性失业呢?这里借用 UV 分析的概念(Dixon & Thirlwall,1975),首先将失业的类型进行分

解表示。

在劳动市场中,失业者 U 与欠员 V (企业求人而未能招到合适的人员数) 都会同时存在,若 L_S 为劳动力供给, L_D 为劳动需求, $L_S - L_D$ 表示劳动市场中供求之差,则

$$L_S - L_D = (E + U) - (E + V) = U - V$$

这里 E 为就业者, $U - V$ 表示因劳动市场供求不平衡所产生的需求不足性失业,与 V 数量同等的失业量则表示劳动市场中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当 $U = V$ 时,劳动市场的供求达到平衡,这时的失业中不再存在需求不足性失业,完全是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可以看作达到了充分就业。为方便表述起见,上式可进一步变形表示为,

$$U = (L_S - L_D) + V$$

这样,失业 U 便表示为前项 $(L_S - L_D)$ 的需求不足性失业与后项 V 的结构性摩擦性失业之和。由于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开展欠员的统计工作,不可能利用欠员 V 来分辨失业中的结构性和摩擦性部分。但是可以预料随着结构改革和体制改革的力度增大,在职人员的失业可能会与新的工作岗位招收不到合适的人员所出现的欠员同时增加,使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增加。

至于需求不足性失业 $(L_S - L_D)$,不限于只在经济衰退时才出现,即使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只要劳动供给多于劳动需求,就会有此类型的失业存在,它随着劳动供求平衡的变化而增减。而我国劳动市场的特点是,当经济波动时,劳动供求平衡变化主要来自劳动需求 L_D 的变化,城镇劳动力供给 L_S 基本不受经济增长影响。这是因为,第一,城镇劳动市场对于农村劳动力基本是封闭的,受制度约束较强,即使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对于正式职工的替代作用很小;第二,城镇新生劳动力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口结构,不论经济如何波动,他们都会固定性地进入劳动市场。这种劳动力供给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不大相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在经济成长时期由于没有严格的流动限制会大量涌入城市;同时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动需求的增加往往促进妇女等非就业者进入劳动市场,因此当需求 L_D 增加时,供给 L_S 也相应增加,失业人员 U 不一定会减少。而在我国,因为劳动供给 L_S 基本不变,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单位又基本上不采取调节在职人员的方式,劳动需求 L_D 的变化就直接反映到招收新生劳动力和失业者的力度上,经济规模扩大时多招收,经济紧缩时少招收,直接影响失业流入和失业流出。因此在我国,经济波动容易引起需求不足性失业变动,从而使失业 U 具有随着经济波动而变化的特性。另外,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就业状况和失业率都是滞后于经济波动一定时期反映出来,因为企业在适应生产需要时不仅通过调整招收新人的规模,还可以削减人员,而这种调整方法不可能即时决定,要有判断经济走势的一定时间,因此失业一般常常滞后于经济波动 1~2 年才表现出来。而我国由于就业量扩大主要依靠招收新人,因此就业量以及失业率容易在当年就反映出和经济增长一致的状况。

实际的统计数字确认了这一特点。图 1 显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率、城镇就业量与失业率的变化关系。1981 年以后,GDP 增长率所显示的经济波动和失业率正好呈逆反的联动关系,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失业率就较低,相反也同样,只有 1990 年例外。只是失业率不象经济波动那样振幅敏感,而且是非对称的,经济大幅度下落时,失业率上升幅度大,如 1986 年、1989 年,而经济回升时失业率的回落幅度并不大,如 1987 年、1992 年,因此失业率的总体水平

从回城青年失业问题基本得以解决的 80 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高。由此可见,我国的失业率具有较明显的经济循环的特征,具有反映劳动市场供求平衡($L_S - L_D$)的性质,同时长期的上升趋势也显示出结构性失业 V 的因素在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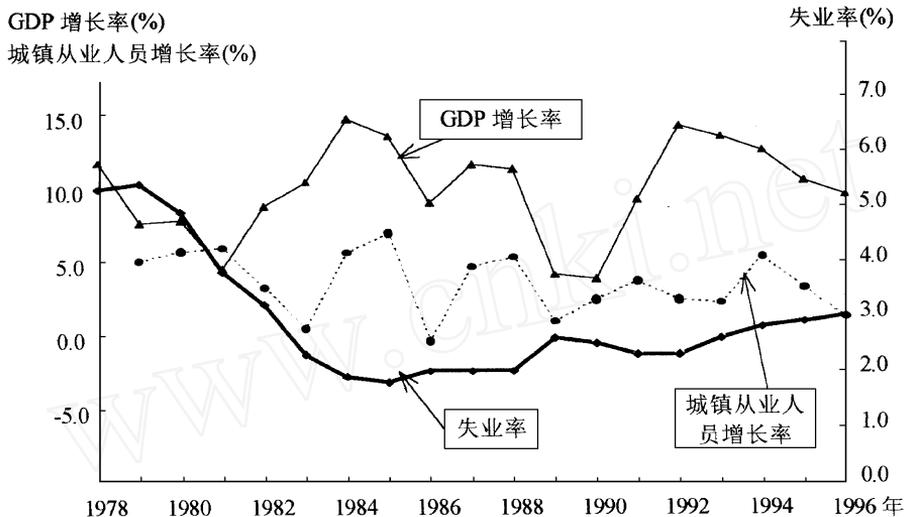


图 1 我国失业率的长期变动与经济波动

注:城镇从业人员为《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1 表中各种经济从业人员之和。这里没有采用 1-1 表中的总数,因为 1996 年以后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城镇从业人员总数不等于各种经济从业人员的总和。

这里应该补充指出的是,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的指标严格地讲应当是劳动市场求人与求职状况。特别是在我国,进入 90 年代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企业越来越成为真正的经营主体,在用工自主的市场机制下所吸收的新生劳动力肯定少于计划经济时期任务性的安置量,此外企业还要不断消化 80 年代为止“过度就业”的部分,因此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同幅度的就业量和求人的增长。从图 1 也可观察到,90 年代以后经济增长和城镇就业量的关系不如 80 年代那么密切。由于我国 1996 年前后才开始在大城市开展关于求人和求职的统计工作,不能满足表示劳动供求平衡的长期变化。但是从 1996 年后建立了劳动市场供求状况统计的北京市来看,1995 年到 1996 年,北京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 12.4% 下降到 9.2%,劳动市场求职与求人之比由 1.03 上升到 1.25(第 4 季度),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是同步变化的,可以一定程度地说明供求状况。

四、失业率变动的因素与类型分解

以上讨论确认了我国的失业率具有需求不足性部分与结构性摩擦性部分,它们分别受经

日本的失业率在长期低位且振幅较小方面与我国很相似,但研究结果(梅村又次,1971)表明这并不能否定日本的失业率对于景气循环是敏感的。

比如胡鞍钢(1996)也指出,“八五”期间与 80 年代相比,就业没有随着经济增长同步增长,同时解释其原因主要是“资本深化”的结果。笔者认为他忽略了就业机制的变化。

根据北京市职业介绍中心发布的劳动供求状况数据。

济景气波动与结构调整因素的影响。这里我们再尝试对这些因素进行数量化,以解释我国失业率的长期变动,并在此基础上分解失业率,由此判断各个阶段失业率上升的类型和解决对策。数量化分析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被说明变量为1981—1996年的失业率,说明变量参考了国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水野朝夫,1992;Bureau of Labour Market Research, Australia, 1987),采用以下几个指标:

(1)上一年的失业率(U_{t-1})。根据我们上面的讨论,上一年未结余的失业者也是主要的劳动力供给,影响新生劳动力的失业发生和失业流出。

(2)经济增长率(Y)。我们前面的讨论中用此来表示劳动的供求平衡程度,代表需求不足性的失业因素。

(3)结构变化指标(STO)这里主要区分了公有经济(国有经济+城镇集体经济)和其他经济两组的职工增长差异,作为产业结构变化、体制改革的指标,以此代表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因素。在我国,夕阳产业、衰退产业集中在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而其他所有制经济则多分布在成长产业和新兴产业,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就业上就体现为公有经济的缩小与非公有经济的扩大,就业体制的改革更是就业者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向其他经济转移的过程。因此,公有经济与其他经济之间就业人数的变化可以表现结构变化的力度和速度。由于失业者寻找新的工作或通过训练能胜任新的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故结构变化、体制改革的力度越大,失业率就会越高。具体的指标这里参考Stoikov(1966)使用的STO指标,它的定义如下:

$$STO = \frac{\sum_{i=1}^n |E_i - E|}{E} / E$$

其中, E 为全体就业者数, E_i 为公有经济($i=1$)或其他经济($i=2$)的就业者数, E 为就业变化率。

(4)直接招收的农村劳动力占城镇新就业人数的比例(F),表示使用农村劳动力而挤占城镇劳动力就业机会的程度,从而产生对失业率的影响。

(5)城镇劳动力的供给这里不作为说明变量,主要考虑两点。一是近年来城镇劳动力供给对失业的影响已经减少,二是劳动力供给是客观条件,不太具有短期调整的政策含义。

回归分析的结果如以下所示:

$$U_t = 0.746 + 0.601U_{t-1} - 0.052Y + 0.033F + 2.246STO \quad (1)$$

$$(1.72) \quad (8.07) \quad (3.21) \quad (2.63) \quad (1.76)$$

$$R^2 = 0.92, \quad D. W. = 1.980$$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现出,预测失业率与实际失业率的吻合程度很高(图2)。式(1)中每个说明变量下面的括号内数值表示系数的 t 统计值,都较高,具有统计意义,说明所选的说明变量1981年以来对失业率都产生了影响,而且正负符号也都符合合理的期待。基于式(1)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从统计意义上确认我国的失业率变动受经济波动、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和

有关就业的回归分析在我国已有一些尝试,但主要以就业人数为被说明变量,目的在于观察经济增长会创造多少新的就业机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劳动部课题组(1996)。这些研究主要从劳动需求的变化角度来考察,而非失业率所表现的劳动市场的供求平衡状况。

上一年失业率的影响。特别是验证了本文所关心的经济波动和失业率的互动关系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可以说明我国的失业率对于经济波动是敏感的。

在上面回归结果式(1)的基础上,改良澳大利亚劳动市场研究局(Bureau of Labour Market Research, Australia, 1987)提出的方法可以对失业的类型进行分解。首先,因为当达到充分就业时仅存在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我们这里设定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是当经济增长率曾达最高水准(14.7%)并且农村劳动力的使用曾在最低水准(9.9%)时所存在的失业,式(1)中的截距也看作是这一类型的失业,即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为:

$$U_t(S) = 0.746 + 0.601U_{t-1}(S) - 0.052 \times 14.7 + 0.033 \times 9.9 + 2.246STO$$

其次,经济波动所产生的需求不足性失业设为实际经济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最高点之差所产生的失业,即:

$$U_t(C) = 0.601U_{t-1}(C) - 0.052 \times (Y - 14.7)$$

再次,农村劳动力的使用挤占了城镇劳动力就业机会而产生的失业为:

$$U_t(F) = 0.033 \times (F - 9.9)$$

同时, $U_t = U_t(S) + U_t(C) + U_t(F)$ (2)

这里需注意到,经济增长率 Y 即便达到最高点的 14.7%,需求不足性失业 $U_t(C)$ 也并不为 0,因为上一年需求不足性失业 $U_{t-1}(C)$ 还有残留, $U_t(S)$ 和 $U_t(F)$ 也同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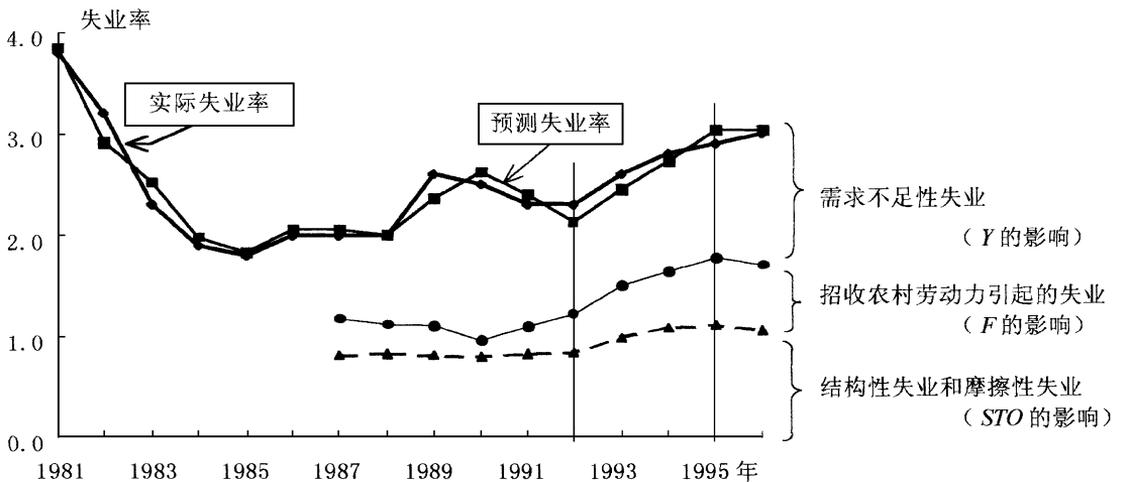


图 2 我国失业率长期变动的回归分析结果与因素分解

为了分解计算 $U_t(S)$ 、 $U_t(C)$ 、 $U_t(F)$, 必须确定 $U_{t-1}(S)$ 、 $U_{t-1}(C)$ 、 $U_{t-1}(F)$ 即上一年的数据, 而它们是不定的。这里我们考虑到,

$$U_t(C) = 0.601U_{t-1}(C) + \dots = 0.601 \times (0.601U_{t-2}(C) + \dots) - 0 \times U_0(C) + \dots$$

因而 $U_0(C)$ 的设定对长期以后的 $U_t(C)$ 并不重要, 在此将其设为 0, $U_0(S)$ 、 $U_0(F)$ 也按照同样原理设为 0, 1987 年以后式(2)右边三者的和趋近于实际值 U_t 。失业因素的分解结果显示在图 2 上。

从 1987 年以后的来看, 到 1992 年为止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基本上没有增加, 农村劳动力使

用因素也在减少,引起 80 年代末的失业增加主要来自需求不足性失业的增加。1992—1995 年,结构性失业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加,同时农村劳动力引起的失业以及需求不足性失业也都在增加。到 1996 年则主要表现在需求不足性失业的增加,与前面流量分析中所表示的特点相符。整体来看,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占我国失业的一定比例,但是失业率的波动基本上由需求不足性失业和农村劳动力使用的影响所决定,这两者的变化幅度比较大。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作为本文的分析结论和政策含义,这里归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虽然我国的失业率因种种限制不可能完全表示失业的所有状况,但是其倾向的变动是连续的,可以作为政策判断的基础依据。通过分析我国失业流量以及数量性回归分析,可以确认以下两点。(1)从失业率的长期变动来看,我国失业率具有反映劳动市场供求平衡状况的性质,而且主要反映的是经济波动所派生的劳动需求的变化。换言之,在现阶段对我国失业率变动的影响主要还是宏观经济的波动,失业率对经济波动还是比较敏感的,而结构性因素和摩擦性因素还没有对失业率的变动带来较大的影响。(2)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处于高位区,但是在劳动供给慢性过剩的条件下由于最近增长的相对缓慢,需求不足性失业增加已成为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第二,基于以上分析的结果,作为政策含义,关键是要明确减少需求不足性失业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本文分析中由于确认了我国最近的失业率上升主要来自需求不足性因素,才能说明在扩大下一轮的景气中有降低失业率的余地和可能,保证扩大总需求对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是有效的,这给予现已开始的扩大总需求政策补充了理论依据。同时,由于本文分析中明确了我国经济波动与失业率之间的互动关系,便可推及当将物价作为判断基准采取紧缩或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时,失业率就会受到影响并随之变动,而且与物价呈逆反关系。正如 1994 年以后我国采取以控制物价水平为主的宏观经济紧缩政策后,物价得到控制,但同时以需求不足性失业为主的失业率增加成为代价。鉴于就业又是社会安定的基本要素,因此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今后宏观经济政策中有必要将就业与物价同样作为政策调控目标之一,根据两者的轻重缓急权衡决定各个时期的主要政策目标。

但是,不论以上的政策讨论还是我国现实所采取的政策都是以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理论为基础的,与此相对立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等学说则强调扩大有效需求的无效性(Friedman,1968),指出任何劳动市场通过工资和就业量的调节,其长期均衡的失业率都会趋近于自然失业率,增加有效需求不仅不会根本性地解决失业问题,反而会引起物价也同时上涨的滞胀现象。因此主张应该健全劳动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尽量减少政府的经济介入,同时刺激扩大民间的设备投资,英国、美国等国家在 70 年代末期至 80 年代采取了这种政策(水野朝夫、谷弘一,1983)。

确实,我国劳动供给的慢性过剩造成的失业也不可能依靠短期内刺激景气的政策得到完全解决,还要通过劳动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等结构调整的长期效果来改善劳动供求结构。作为我国现阶段的特点,需要把握处理好短期经济景气 and 结构调整的适度问题。过松的经济环境会掩盖矛盾和问题,使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减弱,而过紧的经济环境也会使结构调

整所减少的就业机会难以由新的就业机会来弥补,导致结构性失业的长期化。因此,当新一轮经济启动政策在扩大经济规模以及减少需求不足性失业方面显现效果后,应再推进结构调整和就业方面的体制改革的力度,这样就不会引起失业率的大幅度上升。

参考文献

- 戴园晨,陈东琪,1996:《劳动过剩经济的就业与收入》,上海远东出版社。
- 胡鞍钢,1997:《中国就业状况分析》,《管理世界》第3期。
- 劳动部劳科所课题组,1996:《中国未来十年就业发展战略研究》,《管理世界》第1期。
- 杨宜勇等,1997:《失业冲击波》,今日中国出版社。
- 黑板佳央,1988:《宏观经济学与日本的劳动市场——从供给角度的分析》,东洋经济(东京)。
- 梅村又次,1971:《劳动力的结构和雇用问题》,一桥大学经济研究丛书23,岩波书店(东京)。
- 明石喜彬,1997:《失业的理论和实证》,中央经济社(东京)。
- 水野朝夫,1992:《日本的失业行动》,中央大学出版部(东京)。
- 水野朝夫,谷弘一,1983:《发达国家的失业结构——苦恼的现状和背景》,有斐阁(东京)
- Bureau of Labour Market Research, Australia, 1987,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Labour Market*,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Dixon, R. J., Thirlwall, A. P., 1975, *Regional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Macmillan.
- Foster, W. F., Gregory, R. G., 1984, "A Flow Analysis of the Labour Market in Australia", in R. Blandy and O. Covick (eds.), *Understanding Labour Markets in Australia*, Sydney/London/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Friedman, M.,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8, No. 1.
- Holt, C. C., David, M. H., 1966, "The Concept of Job Vacancies in a Dynamic Theory of the Labour Market", in *The Measur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Job Vacancies*, A Conference Report of the NBER, New York: NBER.
- OECD, 1994, *The OECD Jobs Study: Facts, Analysis, Strategies*, Paris: OECD.
- Stoikov, V., 1966, "Some Determinants of the Level of Frictional Unemploy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93, No. 5, May.

(责任编辑:郑 健)(校对:子 璇)

欢迎订阅 1999 年《经济与管理研究》

《经济与管理研究》创刊于 1980 年,已经走过 19 年的历程,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最先创刊,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综合经济类刊物之一。由于本刊随改革开放应运而生,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与经济建设共命运,19 年来,倍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爱戴。1992 年以来,连续被评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7 年又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经济与管理研究》作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联合出刊的重要期刊,辟有财政金融、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农业经济、对外贸易、地方经济、房地产经济、经营与管理、财务会计、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经贸学人、市(县)长论坛、企业家论坛、优秀企业家等栏目。

《经济与管理研究》为双月刊,主编郑海航,定价 4.50 元,欢迎您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国内统一刊号:CN—1384/F,国内发行代号:2—254;国外发行代号:BM742。如果您错过了当地邮局订阅时间,可随时直接向本刊编辑部邮购。地址:北京朝外红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内,邮政编码:100026 电话:65976484。

《经济与管理研究》编辑部